

税收征管数字化与企业盈余管理的策略性选择^{*}

方红生 夏恺楠

内容提要:推进税收征管数字化升级、提升税收治理效能,是深化税收征管改革的应有之义。本文基于“金税三期”工程的准自然实验,利用2009—2016年A股上市公司数据,研究了税收征管数字化对企业应计盈余管理、真实盈余管理和分类转移盈余管理方式选择的影响。研究发现,税收征管数字化显著降低了企业应计盈余管理和真实盈余管理程度,但提高了分类转移盈余管理程度。这一效应是由于税收征管数字化降低信息不对称,促进纳税遵从、落实税收优惠,抑制了应计和真实盈余管理,但无法约束分类转移盈余管理,导致企业提高分类转移盈余管理程度以替代受抑制的应计和真实盈余管理。异质性分析表明,税收征管数字化对企业盈余管理策略性选择的影响主要体现在非国有企业、非政治关联企业和地税局征管企业中。本研究为推进税收征管数字化建设、完善现代公司治理指明了方向。

关键词:税收征管数字化 “金税三期”工程 盈余管理

作者简介:方红生,浙江大学经济学院教授,310058;

夏恺楠(通讯作者),浙江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研究生,310058。

中图分类号:F81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8102(2025)04-0022-17

一、引言

2021年3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进一步深化税收征管改革的意见》提出,要全面推进税收征管数字化升级和智能化改造,加快推进智慧税务建设,不断强化税收大数据在经济运行研判和社会管理等领域的深层次应用,深入推进精确执法、精细服务、精准监管、精诚共治,大幅提高税法遵从度和社会满意度,充分发挥税收在国家治理中的基础性、支柱性、保障性作用。以“金税”系列工程为代表,现代化信息采集、数据分析技术在税收征管领域的应用标志着我国税收征管正由“以票管税”向“以数治税”模式转变。在此背景下,如何提高税收征管数字化的治理功能,发挥税收的经济调控职能,激发市场主体活力,成为税收征管改革亟须研究的重要

^{*} 基金项目:研究阐释党的二十大精神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有利于共同富裕的税收制度改革研究”(23ZDA020)。感谢匿名审稿专家的宝贵意见,文责自负。夏恺楠电子邮箱:xkn@zju.edu.cn。

问题。

企业盈余管理的目的在于通过调整报告利润及真实利润分布,影响财务报表使用者的相关决策,以最大化企业或经营者自身利益。例如,通过向上盈余管理调增利润,美化经营业绩(Teoh等,1998)、避免亏损(吴联生等,2007)、提高市场评价(Haw等,2004),或通过向下盈余管理调减利润,实现高管与大股东自利(Perry和Williams,1994)、规避监管关注(Ramanna和Roychowdhury,2010),或利用先向下、后向上的盈余管理,避免连续亏损引起的退市风险(陆建桥,1999)以及为未来储备利润(程新生等,2022)。现有研究表明,税收征管能够发挥外部治理功能(曾亚敏、张俊生,2009),抑制企业机会主义盈余管理行为,改善盈余质量(叶康涛、刘行,2011)。特别地,大数据、云计算等数字化技术融入税收征管,能够进一步强化逃避税威慑(Pomeranz,2015),在提高会计信息质量方面发挥治理作用。基于中国的税收征管数字化实践,部分学者利用“金税三期”工程构建准自然实验,检验了税收征管数字化对应计盈余管理和真实盈余管理的影响,但得出的结论存在较大差异(王雪平,2020;孙雪娇等,2021;李增福等,2021;朱凯等,2021;许丹丹、上官鸣,2022)。

已有研究指出,由于实施成本的不同,不同盈余管理方式间存在替代关系(Cohen和Zarowin,2010;Zang,2012),企业管理层在应计、真实和分类转移三类盈余管理方式间偏好成本更小的方案(Fan等,2010;刘宝华等,2016)。相较于应计和真实盈余管理,分类转移盈余管理通过利润表内经常性和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的错误分类调节核心盈余,只改变企业利润表的盈余结构,不影响利润总额与应纳税额(McVay,2006),具有实施成本低、隐蔽性强、监管风险低等优势,逐渐成为企业管理层青睐的盈余管理方式(Abernathy等,2014;Liu等,2022)。本文利用2009—2016年A股上市公司数据与“金税三期”工程构建准自然实验,考察税收征管数字化如何影响企业三类盈余管理,研究发现:税收征管数字化显著抑制了应计与真实盈余管理,但促进了分类转移盈余管理。这一效应是由于税收征管数字化降低信息不对称,促进纳税遵从、落实税收优惠,提高了企业应计和真实盈余管理的实施成本,从而产生抑制效应,但现行会计准则为经常性和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分类留下了较大的主观判断和解释空间,“金税三期”系统也并未将经常性和非经常性损益指标的判别和转换纳入财务预警和监测,同时,由于分类转移盈余管理不影响企业各项税种的应纳税额,税务部门缺乏监测企业分类转移盈余管理行为的动机,导致税收征管数字化无法有效约束分类转移盈余管理。“金税三期”工程实施后,企业利用应计和真实盈余管理调增利润的行为受到较大限制,企业会策略性地从成本较高的应计和真实盈余管理转向成本较低、隐蔽性更强的分类转移盈余管理,以调增核心利润、最大化盈余管理收益。异质性分析表明,税收征管数字化对企业盈余管理策略性选择的影响主要体现在非国有企业、非政治关联企业和地税局征管企业中,这类企业的策略性盈余管理现象在税收征管数字化实施后更为突出。

与现有文献相比,本文的贡献在于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丰富了税收征管与盈余管理的研究内容。现有关于税收征管对盈余管理的影响研究重点关注了征管强化对应计和真实盈余管理的影响(曾亚敏、张俊生,2009;叶康涛、刘行,2011;孙雪娇等,2021;李增福等,2021;朱凯等,2021;许丹丹、上官鸣,2022),但忽视了税收征管对分类转移盈余管理的重要作用。本文利用“金税三期”工程试点,将税收征管与三类盈余管理行为有机结合,考察了税收征管对企业盈余管理策略性选择的影响,是对税收征管经济后果及盈余管理影响因素研究的有益补充。

第二,深化了税收征管数字化影响盈余管理的机制分析。此前的研究分别从缓解信息不对称(王雪平,2020;孙雪娇等,2021;李增福等,2021;许丹丹、上官鸣,2022)、提高盈余管理的税收成本(李增福等,2021;朱凯等,2021)角度,检验了税收征管数字化对应计和真实盈余管理的影响,但得出的结论莫衷一是。本文将分类转移盈余管理引入分析框架,基于税收征管数字化特点及三类盈余管理间的权衡替代关系,提出“信息不对称缓解—成本差异—策略替代”的分析路径,阐明税收征管数字化抑制了应计和真实盈余管理,却刺激了分类转移盈余管理的内在逻辑,深化了税收征管数字化影响盈余管理的机制分析。

第三,提出了深化税收征管改革,完善现代公司治理的政策建议。相较于应计和真实盈余管理,企业通过分类转移盈余管理虚增核心利润的行为往往更为隐蔽、难以发现,容易导致企业核心盈余被高估(McVay,2006;Liu等,2022)。本文研究表明,税收征管数字化能够有效地抑制企业应计和真实盈余管理,但会导致企业更多地转向分类转移盈余管理,引发核心盈余的错误定价,特别对于非国有企业、非政治关联企业和地税局征管企业,策略性盈余管理现象更为突出,现有的“金税三期”系统未能有效监管分类转移盈余管理,应当持续推进税收征管数字化建设、精准治理机会主义盈余管理,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保障。

二、政策背景与研究假说

(一)我国“金税”工程背景

自1994年以来,为加强对增值税发票的监管,防止税收流失,我国逐步启动了“金税”工程,至今已完成三个阶段的建设和推广。前两个阶段“金税”工程的核心目标是建立全面的增值税交叉审计和防伪税控体系,有效管理增值税发票。^①随着经济和社会的快速发展,纳税人数量急剧增加,企业的商业模式和会计方法变得越来越复杂,充分利用现代技术加强信息收集和利用是提高税收征管质量和效率的根本途径。因此,从2009年开始,国家税务总局启动了“金税三期”信息系统建设,将信息化和大数据分析技术融入税收征管。自2013年2月以来,该系统已在全国各省市分批逐步上线,目的是在“金税一期”和“金税二期”工程的基础上,完善所有税种的纳税申报和监管体系。^②与前两期相比,“金税三期”的建设涵盖了所有税种的税务信息管理系统,并加强了税务机关内部、税务机关与其他部门、税务机关与第三方机构以及不同信息系统之间的信息共享,便于税务机关全面了解企业日常运营和税务相关信息,促进监督管理,最终实现提高税收征管效率的政策目标。

(二)税收征管数字化与企业盈余管理

信息不对称是税收征管的核心问题(Lederman,2010),也是企业开展盈余管理的重要前提(李春涛等,2016)。企业会利用信息不对称环境开展机会主义盈余管理,以及调整应计、真实和分类转移盈余管理的运用程度(Cohen和Zarowin,2010;Fan等,2010;Zang,2012;刘宝华等,2016),实现利润调节目标。以“金税三期”工程为代表,税收征管数字化将云计算、大数据技术引

^① 1994—1998年,“金税一期”工程在全国50个城市进行了试点,主要使用手工输入进行数据收集和发票监控。1998—2003年,“金税二期”工程启动并逐步扩围,应用互联网技术对增值税发票进行网络化管理,在全国建立了覆盖国家税务总局、省级税务局、市级税务局以及县级税务局的四级交叉审计和发票查询系统,整合了发票审计和防伪税控系统,并将海关增值税缴款凭证纳入管理系统,实现了数据共享和功能互补,加强了增值税源头管控。

^② 限于篇幅,正文未展示“金税三期”工程的具体架构和内容,留存备案。

入税务处理,能够明显改善企业与税务部门在征收税款和享受税收优惠过程中的信息不对称问题,实现促进纳税遵从和落实税收优惠两项目标(樊勇、李昊楠,2020),进而改变企业的盈余管理方式选择。

从纳税遵从的角度来看,税收征管数字化能够提高企业涉税信息透明度和基层征税信息透明度,促进纳税遵从,增加企业通过应计和真实盈余管理调增利润的税负成本。一方面,税收征管数字化提高了企业涉税信息透明度。依托大数据和云计算技术,“金税三期”在数据收集、共享、处理和应用等方面实现巨大突破(刘慧龙等,2022),构建起税务部门之间以及税务与社保、工商、海关等多部门联网,全国税收数据大集中和跨地区、跨行业信息跟踪,显著改善了企业涉税信息获取与共享问题(樊勇、李昊楠,2020),有效限制了企业偷漏税空间。另一方面,税收征管数字化提高了基层征税信息透明度。“金税三期”建立起统一的税务标准代码体系、表单文书标准、业务需求规范和业务工作手册,实现全国税务部门业务规范统一化、税收管理规范化和制度化,企业经营信息直接上传至省级税务机关集中处理,能有效防止寻租设租行为对基层征税的干扰,降低基层税务执法弹性,减少政治关联、征纳合谋因素对企业纳税遵从的影响(李增福等,2021)。

应计盈余管理利用会计政策及会计估计空间调节利润的期间分布,包括应税项目和非应税项目操纵部分。^①真实盈余管理采取加速销售、超量生产和减少酌量性费用增加当期利润(Roychowdhury,2006),均通过应税项目调节利润。^②应税项目应计盈余管理和真实盈余管理在提高会计利润的同时也会提高当期所得税应纳税额(李增福等,2011;Zang,2012)。税收征管数字化提高了企业产销业务的涉税信息透明度和基层征税信息透明度,促进纳税遵从,增加应税项目应计盈余管理和真实盈余管理税负成本,理性的企业管理层将降低应计和真实盈余管理程度,以规避盈余管理引起的所得税负担。

从税收优惠的角度来看,税收征管数字化能够增进政府与企业间财务信息和税收优惠信息的双向传递,落实税收优惠,降低企业利用应计和真实盈余管理获取税收优惠的动机。完全信息市场下,企业只有如实地反映经营状况与自身偏好,才能获得政府提供的税收优惠(柳光强,2016)。一方面,“金税三期”实现多部门数据联网,在政府层面加强了对企业生产经营的实时监管与稽查,实现企业关键财务指标、异常信息及数据逻辑关系的详细比对分析,使税收优惠相关财务信息更及时准确地到达政府端,提高政府对企业财务状况和税收优惠落实情况的掌握,企业利用应计和真实盈余管理调增利润获取更多税收优惠的行为会受到更加严密的监管。另一方面,“金税三期”建设信息化纳税服务平台,在企业层面简化涉税事项办理、提升纳税服务质量,使税收优惠相关信息更及时准确地到达企业端,提高纳税人对税收优惠政策的认知程度,降低税收优惠申请成本(樊勇、李昊楠,2020)。

① 应税项目应计盈余管理主要包括错误运用收入确认条件、不合理估计完工百分比、提前开具产品销售发票等方式提前确认收入,以及将应当费用化的支出资本化、延后确认潜在亏损、不确认实际坏账损失等方式推迟确认成本费用,在提高会计利润的同时会提高当期应纳税所得额。非应税项目应计盈余管理主要包括不合理地计提资产减值损失、改变资产折旧摊销的方法和时间、调整坏账准备估计金额等方式调节会计利润,经纳税调整后不会影响当期应纳税所得额。

② 企业能够通过加速销售、超量生产和减少可自由支配支出三种方式实施真实盈余管理(Roychowdhury,2006)。当管理层预期当前的经营业绩不令人满意时,通常有动机通过提供销售折扣或放松信贷政策来吸引客户,暂时增加销售额和加速现金流入,或是通过超量生产降低单位产品成本,增加营业利润,以及减少当期可自由支配的宣传、销售、员工培训等费用支出,增加当期利润,在提高会计利润的同时会提高应纳税所得额。

现有的税收优惠政策如企业所得税税率减免、研发费用加计扣除等,其适用条件往往与企业的财务状况、会计政策和会计估计挂钩,在信息不对称环境下,企业会利用自身信息优势,通过机会主义盈余管理获取税收优惠。例如,税收优惠资格获取方面,企业可能通过应计和真实盈余管理调增相应收入,达到技术先进型服务企业或先进制造业认定中^①对技术先进型服务业务收入占比、先进制造业相关收入占比需超过一定比例的要求,以获得企业所得税优惠税率、增值税留抵退税、增值税进项税额加计抵减等税收优惠。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方面,企业可能利用应计和真实盈余管理将不符合资本化条件的研发费用支出资本化,以减少当期费用、调增当期利润(刘永涛,2018)。地方性税收优惠政策方面,企业会利用应计和真实盈余管理调增利润,营造良好的盈利形象,以获得地方政府的税费返还等税收优惠(杜瑞、李延喜,2018)。税收征管数字化改善政企间财务信息和税收优惠信息不对称,能够强化政府对企业财务的监督,遏制企业利用盈余管理获取税收优惠,同时促进税收优惠落实,减少企业获取税收优惠的制度性交易成本(孙雪娇等,2021)、抑制盈余管理动机,从而降低应计和真实盈余管理程度。由此本文提出第一个假说。

假说1:税收征管数字化将降低企业应计和真实盈余管理程度。

企业的价值及未来盈利预测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企业的核心盈余,与非核心盈余相比,核心盈余具有更多的信息含量,在投资者决策中能够起到关键作用(McVay,2006;刘宝华等,2016)。分类转移盈余管理通过利润表内经常性损益和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的错误分类调节核心盈余,包括将经常性费用分类为非经常性损失,或将非经常性收益分类为经常性收入。相较于应计和真实盈余管理,分类转移盈余管理只改变企业利润表的盈余结构,不会改变利润总额与应纳税所得额,也不需要构建超出正常经营活动的真实交易,实施成本更低、隐蔽性更强、对企业未来发展的负面影响更小(周夏飞、魏炜,2015)。同时,会计准则对于核心盈余和非经常性损益的划分标准比较模糊,企业的经常性费用与非经常性损失、经常性收入与非经常性收益的分类往往涉及大量的管理层主观判断,致使分类转移盈余管理的隐蔽性更强、被审计师和监管机构审查的风险更低(Abernathy等,2014;Liu等,2022)。

税收征管数字化能够通过缓解信息不对称抑制应计和真实盈余管理,但无法有效约束分类转移盈余管理,有几方面原因。一是会计准则为经常性和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分类留下了较大的主观判断和解释空间。一般而言,判断损益项目是否属于非经常性损益,主要考虑主业相关性、发生频率及盈利可持续性 etc 定性因素,但仅凭定性指标难以确定企业某项业务是否属于非经常性损益。同时,随着企业经营业务发展的多元化,企业的正常经营业务已不仅仅局限于产品生产、加工、销售,部分投资、筹资等资本经营活动也被纳入主业范畴,^②导致企业很容易实现经常性与非经常性

^① 《财政部 税务总局 商务部 科技部 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将技术先进型服务企业所得税政策推广至全国实施的通知》(财税〔2017〕79号)要求享受税收优惠的企业从事《技术先进型服务业务认定范围(试行)》中的技术先进型服务业务取得的收入占企业当年总收入的50%以上,从事离岸服务外包业务取得的收入不低于企业当年总收入的35%。《关于明确先进制造业增值税期末留抵退税政策的公告》(财政部 税务总局公告2021年第15号)所称先进制造业纳税人,是指按照《国民经济行业分类》,生产并销售“非金属矿物制品”“通用设备”“专用设备”“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医药”“化学纤维”“铁路、船舶、航空航天和其他运输设备”“电气机械和器材”“仪器仪表”销售额占全部销售额的比重超过50%的纳税人。

^② 判断损益项目是否属于主业或主业相关业务,主要依据官方的登记信息及披露文件,包括但不限于:工商登记信息及其他政府报备信息中关于营业范围及产品的内容;披露的定期报告及管理层报告中关于发展目标及业务描述的内容;融资投资文件中关于资金资源投向及战略规划的内容。

损益项目间的转换。二是“金税三期”系统尚未实现经常性与非经常性损益指标的有效判别和监管。目前,利用决策支持子系统,“金税三期”构建起增值税收入与企业所得税收入一致性、存货扣税比、进项税额和销项税额变动弹性、预收账款占比、所得税贡献率、主营业务收入变动率六大异常预警指标(张立光,2021),实现了对企业涉税财务指标的评估预警和有效监管,而分类转移盈余管理并不涉及应税项目与非应税项目的转换,通过涉税数据无法追踪企业的分类转移盈余管理活动。同时,由于分类转移盈余管理不影响各项税种的应纳税额、不会引起税款流失,税务部门缺乏监测分类转移盈余管理行为的动机,导致企业的分类转移盈余管理行为难以被监测和问责。三是现有的税收优惠政策适用条件不包含非经常性损益指标,落实税收优惠对分类转移盈余管理的抑制作用有限。

Graham等(2005)较早指出,应计盈余管理和真实盈余管理间存在替代关系,Fan等(2010)进一步发现,当企业操纵应计项目的能力受到限制时,会更多地采取分类转移盈余管理提高核心利润。因此,考虑到三类盈余管理方式间的替代关系,税收征管数字化通过降低信息不对称,促进纳税遵从、落实税收优惠,抑制了应计和真实盈余管理,会引起报告利润下滑,企业为了弥补报告利润下滑引起的损失,更可能通过分类转移盈余管理提高核心利润,以最大化盈余管理收益。由此本文提出第二个假说。

假说2:税收征管数字化将提高企业分类转移盈余管理程度。

三、研究设计

(一)模型设定

为验证上述两个研究假说,参考张克中等(2020)和刘慧龙等(2022),本文建立如下多时点 DID 模型进行实证检验:

$$EM_{i,j,t} = \beta_0 + \beta_1 Reform_{i,j,t} + Controls_{i,j,t} + \mu_i + v_t + \varepsilon_{i,j,t} \tag{1}$$

模型(1)中,被解释变量 EM 代表盈余管理程度,包括应计盈余管理(AEM)、真实盈余管理(REM)和分类转移盈余管理(CEM)三项指标,^①下标 i,j,t 分别表示企业、地区和年份。核心解释变量 $Reform$ 代表政策试点。遵循张克中等(2020)、樊勇和李昊楠(2020),上半年试点地区当年起 $Reform$ 赋值为 1,下半年试点地区次年起 $Reform$ 赋值为 1,否则为 0。 $Controls$ 代表一系列控制变量,参考现有研究,本文选取企业规模($Size$)、企业年龄(Age)等控制变量,变量说明及定义如表 1 所示。 μ 和 v 分别为公司固定效应和年份固定效应。

表 1 主要变量说明及定义

变量类型	变量名称	变量符号	变量定义
被解释变量	应计盈余管理	AEM	采用 Dechow 等(1995)修正 Jones 模型测算
	真实盈余管理	REM	采用 Roychowdhury(2006)、Cohen 和 Zarowin(2010)模型测算
	分类转移盈余管理	CEM	采用 McVay(2006)、Fan 等(2010)模型测算
核心解释变量	“金税三期”试点	$Reform$	试点地区企业试点实施后取 1,否则取 0

① 限于篇幅,盈余管理指标具体测算模型见线上附录 A。

续表 1			
变量类型	变量名称	变量符号	变量定义
控制变量	企业规模	<i>Size</i>	ln(期末总资产)
	企业年龄	<i>Age</i>	ln(企业成立年数+1)
	独立董事占比	<i>IND</i>	独立董事人数/董事会人数
	员工数	<i>Labor</i>	期末员工人数/(期末总资产/10000)
	资产负债率	<i>Lev</i>	期末总负债/期末总资产
	总资产收益率	<i>ROA</i>	净利润/期末总资产
	经营现金流	<i>CFO</i>	当期经营现金流/期末总资产
	存货密集度	<i>SI</i>	期末存货净值/期末总资产
	是否亏损	<i>LOSS</i>	当年亏损取 1,否则取 0
	控股股东持股比	<i>FIR</i>	控股股东期末持股数/期末总股数
	高管持股比	<i>MS</i>	高管期末持股数/期末总股数
	经济发展	<i>GDP</i>	ln(地区生产总值)
	产业结构	<i>SIP</i>	第二产业产值/地区生产总值

(二)样本数据筛选

“金税三期”应用系统自 2013 年 2 月起在全国分批次单轨上线,至 2016 年 10 月完成全国单轨上线,遵循张克中等(2020)、樊勇和李昊楠(2020)、孙雪娇等(2021)的研究,为便于区分实验组和对照组以识别政策效应,避免 2016 年 10 月起“金税三期”全面实施对识别政策效应造成干扰,本文将样本期间限定为 2009—2016 年,选取 A 股上市公司年度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并进行如下样本筛选:(1)剔除金融、保险业上市公司;(2)剔除样本期间新上市、已经退市、被暂停上市或被 ST 和*ST 的公司;(3)剔除关键变量缺失的样本;(4)估计盈余管理水平时,剔除该年份行业内公司数少于 10 家的行业样本。本文使用的数据来源于 CSMAR 和 Wind 数据库,“金税三期”单轨上线时间来源于各省市税务局官方网站和新闻报道。所有连续变量均进行了 1% 和 99% 分位数上的 Winsorize 缩尾处理,最终得到 7508 个观测值。^①从三类盈余管理的各自情况来看,三类盈余管理的均值、中位数均接近于 0,说明上市公司整体向上操纵盈余和向下操纵盈余程度相当。从三类盈余管理的比较情况来看,真实盈余管理的均值、中位数、标准差均高于应计盈余管理和分类转移盈余管理,同时,真实盈余管理的最小值与最大值的绝对值均高于应计盈余管理和分类转移盈余管理,说明真实盈余管理是样本上市公司盈余管理的主要手段,且上市公司运用真实盈余管理的程度存在较大差异。核心解释变量 *Reform* 的均值为 0.0952,表明约 9.52% 的企业样本受到“金税三期”试点影响。

四、实证结果分析

(一)基准回归

表 2 报告了税收征管数字化对三类盈余管理的影响。第(1)~(3)列分别展示了“金税三期”试点对应计盈余管理、真实盈余管理和分类转移盈余管理影响的回归结果。控制相关变量、公司固

① 限于篇幅,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见线上附录附表 B.1。

定效应和年份固定效应后,第(1)列、第(2)列 *Reform* 的估计系数显著为负,第(3)列 *Reform* 的估计系数显著为正,表明税收征管数字化显著降低了企业应计和真实盈余管理程度、提高了分类转移盈余管理程度。从经济显著性上来看,^①本文发现,税收征管数字化显著降低了企业应计和真实盈余管理程度,分别为-7.05%^②(-6.28%)^③、-11.02%(-11.01%),并提高了分类转移盈余管理程度9.98%(10.43%),证实了假说1和假说2。

表 2 税收征管数字化对三类盈余管理的影响

变量	(1)	(2)	(3)
	<i>AEM</i>	<i>REM</i>	<i>CEM</i>
<i>Reform</i>	-0.0069*** (0.0021)	-0.0352** (0.0130)	0.0061* (0.0034)
控制变量	Yes	Yes	Yes
公司、年份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样本量	7508	7508	7508
Adj-R ²	0.606	0.292	0.101

注:(1)***、**和*分别表示在1%、5%和10%的水平下显著,括号中数值为省份层面聚类的各变量系数稳健标准误,下同。
(2)根据 Roychowdhury(2006)、Cohen 和 Zarowin(2010)提出的模型,企业主要通过销售操控、生产成本操控、酌量性费用操控三种方式进行真实盈余管理。本文考察了“金税三期”对销售操控、生产成本操控、酌量性费用操控三项子指标的影响,未报告的回归结果显示,“金税三期”实施后,企业销售操控程度显著下降,而对生产成本操控和酌量性费用操控影响不显著,表明“金税三期”主要抑制了企业利用加速销售调增利润的真实盈余管理。

(二)稳健性检验^④

1. 平行趋势检验与动态效应

考虑到“金税三期”以省份为单位逐步推广到全国,基准回归结果反映的“金税三期”对盈余管理的影响可能并非源于该项政策本身,而是由政策实行之前不同地区企业的固有趋势所致,该事前趋势的存在会干扰 DID 模型对政策效应的判断。同时,各省市“金税三期”试点方案出台到单轨上线存在一定时间间隔,企业可能存在较强政策预期,在政策实行之前调整盈余管理活动,导致政

① 关于经济显著性,由于本文测算得出的三类盈余管理指标均值均接近于0,无法直接使用“自变量的回归系数/因变量的平均值”这一常用的方法计算“金税三期”对企业盈余管理影响的经济显著性。因此,本文遵循 Fang 等(2016)、Irani 和 Oesch (2016)计算政策冲击对企业盈余管理影响经济显著性的方法,采用政策冲击引起被解释变量变化程度占被解释变量标准差的比例(即 beta 系数,等于政策冲击 *Reform* 变量的估计系数/被解释变量标准差),计算经济显著性。

② 根据本文的主要变量描述性统计(见线上附录附表 B.1)及基准回归结果(见表2),样本企业应计盈余管理、真实盈余管理和分类转移盈余管理的标准差分别为 0.0979、0.3195 和 0.0611,基准回归中 *Reform* 变量的估计系数分别为 -0.0069、-0.0352 和 0.0061。税收征管数字化引起企业应计盈余管理程度下降 7.05%(-7.05%=-0.0069/0.0979),真实盈余管理程度下降 11.02%(-11.02%=-0.0352/0.3195),分类转移盈余管理程度上升 9.98%(9.98%=0.0061/0.0611)。

③ 括号中数值为基于“金税三期”工程实施前(2012 年及之前)处理组样本计算的经济显著性。“金税三期”工程实施前(2012 年及之前)处理组样本企业应计盈余管理、真实盈余管理和分类转移盈余管理的标准差分别为 0.1099、0.3198 和 0.0585。因此,基于处理组样本政策前标准差,税收征管数字化引起企业应计盈余管理程度下降 6.28%(-6.28%=-0.0069/0.1099),真实盈余管理程度下降 11.01%(-11.01%=-0.0352/0.3198),分类转移盈余管理程度上升 10.43%(10.43%=0.0061/0.0585)。

④ 除正文中展示的稳健性检验外,本文另采用倾向得分匹配(PSM)方法,以 2012 年数据将样本进行 1:1 最近邻匹配、半径匹配、核匹配,匹配协变量选取基准回归所有控制变量,之后重新进行回归,结果保持稳健。限于篇幅,该部分结果留存备索。

策效应估计内生性问题。因此,本文参考 Beck 等(2010)和刘慧龙等(2022),构建如下模型进行平行趋势检验:

$$EM_{i,j,t} = \beta_0 + \beta_1 Reform_{t-7} + \beta_2 Reform_{t-6} + \beta_3 Reform_{t-5} + \beta_4 Reform_{t-4} + \beta_5 Reform_{t-3} + \beta_6 Reform_{t-2} + \beta_7 Reform_{t-1} + \beta_8 Reform_{t+1} + \beta_9 Reform_{t+2} + \beta_{10} Reform_{t+3} + Controls_{i,j,t} + \mu_i + v_t + \varepsilon_{i,j,t} \quad (2)$$

本文样本企业首批试点时间为2013年,末批试点时间为2016年,以各地区试点前一年为对照期,模型(2)中 $Reform_{t-7}$ 至 $Reform_{t-2}$ 分别表示各地区企业试点前7年至前2年的虚拟变量, $Reform_{t+1}$ 、 $Reform_{t+2}$ 、 $Reform_{t+3}$ 分别表示试点后1年至后3年的虚拟变量。若满足平行趋势假设,则预期 $Reform_{t-7}$ 至 $Reform_{t-2}$ 的估计系数均不显著。图1展示了三类盈余管理指标的平行趋势检验结果。结果显示, $Reform_{t-7}$ 至 $Reform_{t-2}$ 的估计系数均不显著,表明“金税三期”试点前,企业三类盈余管理程度不存在显著差异。试点后企业应计和真实盈余管理程度显著降低,分类转移盈余管理程度显著提高,平行趋势假设得以满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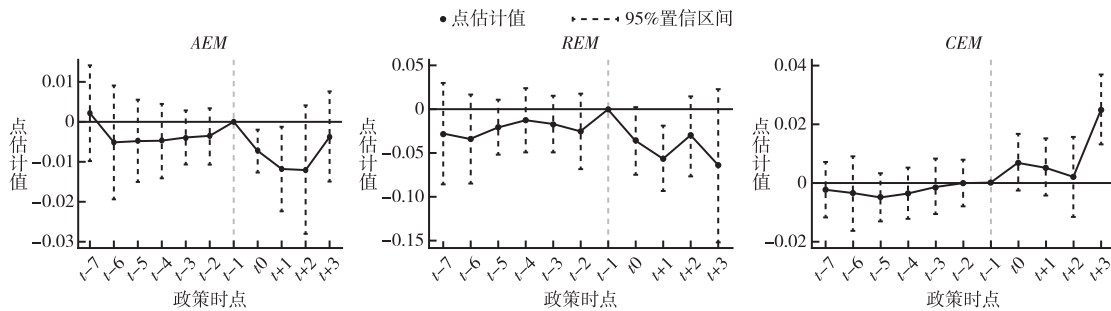


图1 平行趋势检验及动态效应

注:以REM为被解释变量的平行趋势检验中, $Reform_{t-1}$ 的回归系数在10%的水平下显著。限于篇幅,平行趋势检验及动态效应的详细回归结果未报告,留存备案。

动态效应方面,“金税三期”上线当年及次年,应计盈余管理程度和真实盈余管理程度均显著下降,应计盈余管理和真实盈余管理受到明显抑制,上线第三年后对应计盈余管理和真实盈余管理的影响变为不显著,但分类转移盈余管理程度显著提高。可能的解释是,在“金税三期”工程实施的初始阶段,企业通过减少应计盈余管理和真实盈余管理来避免潜在的审查、处罚及税收负担。然而,长期维持低水平的应计盈余管理和真实盈余管理不利于提升企业业绩表现,同时, Hunt 等(1996)指出,短期盈余管理会降低财务会计弹性和后续盈余调整空间,企业无法长期实施低水平的应计盈余管理和真实盈余管理。因此,在后续期间,企业会转向提高分类转移盈余管理程度,以实现优化核心业绩、规避税收负担的盈余管理目标。

2. 安慰剂检验

地区及年份层面的非观测因素与遗漏变量问题可能导致基准回归的结果存在较大偏误。本文通过随机设定试点地区进行安慰剂检验,从全体样本中随机选取新的试点样本进行回归,并将该过程重复1000次,绘制估计系数核密度图,若不存在重要的遗漏变量,则随机试验的估计系数将集中于0附近。图2汇报了1000次随机模拟估计结果,应计、真实和分类转移盈余管理的随机模拟估计系数值聚集于0附近,遗漏变量问题并未导致基准回归结果产生偏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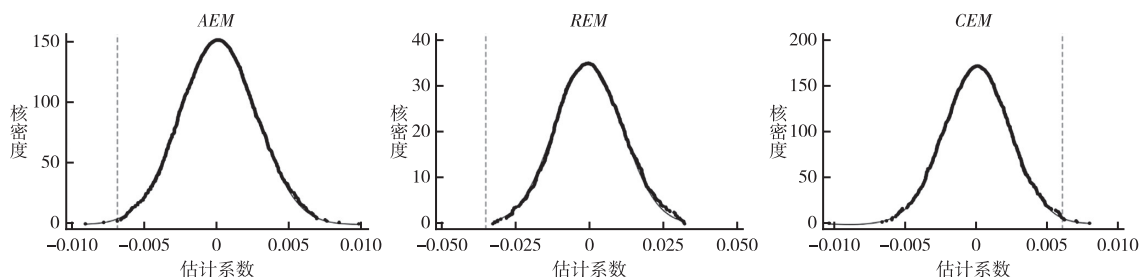


图2 安慰剂检验

3. 排除同期财税政策影响^①

(1)“营改增”政策。始于2012年的“营改增”试点覆盖本文研究的主要样本期间,且“营改增”在行业和地区层面铺开,可能对同期“金税三期”政策效应产生较大干扰。对此,本文根据2012—2016年“营改增”行业和地区试点,构建一组虚拟政策变量,用双重差分法验证基准回归结果是否受到“营改增”政策干扰。结果显示,加入虚拟政策变量 BVT 后, $Reform$ 的系数依然显著,“营改增”未对回归结果产生干扰。(2)固定资产加速折旧政策。2014年生物药品制造业等六大行业开展固定资产加速折旧试点,2015年扩展到轻工、纺织、机械、汽车等四大重点行业,允许企业采用缩短折旧年限或加速折旧方法扣减应纳税所得额,对企业税负与现金流存在重要影响,进而可能改变企业盈余管理行为。对此,本文根据2014年、2015年加速折旧试点,构建一组虚拟政策变量,用双重差分法验证基准回归结果是否受到固定资产加速折旧政策影响。结果显示,加入虚拟政策变量 $Incent$ 后, $Reform$ 的系数依然显著,固定资产加速折旧政策未对回归结果产生干扰。

4. 排除竞争性解释干扰^②

遵循盈余管理研究的经典文献和权威性研究(Dechow等,1995;Roychowdhury,2006;Cohen和Zarowin,2010;Fan等,2010),本文采用应计盈余管理、真实盈余管理的原值衡量企业应计和真实盈余管理程度,发现“金税三期”能够显著降低企业应计和真实盈余管理程度,可能受到竞争性解释的干扰,即若企业存在调减利润动机的向下应计和真实盈余管理,“金税三期”实施对应计和真实盈余管理的负效应可能并非源于抑制了调增利润动机的向上盈余管理,而是促进了调减利润动机的向下盈余管理,这与本文的理论逻辑产生冲突。为了避免企业可能存在调减利润动机的向下盈余管理对本文结论的干扰,首先,本文根据企业应计盈余管理和真实盈余管理指标是否大于0,构建分组变量 AEM_UP 和 REM_UP 。若企业应计盈余管理指标大于0, AEM_UP 取值为1,否则取值为0;若企业真实盈余管理指标大于0, REM_UP 取值为1,否则取值为0。其次,构建政策变量 $Reform$ 与分组变量 AEM_UP 和 REM_UP 的交互项进行回归。结果显示, $AEM_UP \times Reform$ 交互项、 $REM_UP \times Reform$ 交互项的估计系数均显著为负,且加入交互项后, $Reform$ 变量的估计系数均变为不显著,表明对于应计和真实盈余管理指标大于0的企业,“金税三期”实施后,其应计和真实盈余管理程度将显著降低,而对于应计和真实盈余管理指标小于0的企业,“金税三期”实施后,应计和真实盈余管理程度无显著变化,说明“金税三期”显著降低了应计和真实盈余管理指标为正的企业盈余管理程度,并未刺激应计和真实盈余管理指标为负的企业进行更激进地向下盈余管理行为,

① 限于篇幅,排除同期财税政策影响的稳健性检验结果见线上附录附表C.1。

② 限于篇幅,排除竞争性解释干扰的稳健性检验结果见线上附录附表C.2。

本文回归结果保持稳健。

5. 多时点 DID 异质性处理效应^①

政策实施时间不一致引起的异质性处理效应会导致双向固定效应多时点双重差分的估计结果产生偏误。因此,本文进一步使用异质性稳健估计方法对回归结果进行检验。遵循现有代表性研究,分别使用 Sun 和 Abraham (2021)、Butts 和 Gardner (2022)、Cengiz 等 (2019) 的异质性稳健估计方法重新进行了基准回归,回归结果保持稳健。

(三) 机制分析

理论分析部分提出,税收征管数字化能够缓解决税款征纳和税收优惠落实过程中的信息不对称问题,抑制企业应计和真实盈余管理,但无法限制分类转移盈余管理,导致企业转向分类转移盈余管理以替代受抑制的应计和真实盈余管理。该部分针对上述作用机制进行检验。

首先,本文考察税收征管数字化缓解信息不对称对三类盈余管理的影响。现有研究指出,机构投资者和审计师作为重要的外部治理力量,能够有效改善企业信息环境、降低信息不对称程度,参考李春涛等 (2021),本文使用机构投资者持股比和是否为四大审计作为企业信息不对称的代理变量进行分组回归,机构投资者持股比较低和非四大审计,都意味着企业的信息不对称程度较高。机构投资者持股比方面,本文采用 Zwick 和 Mahon (2017) 的方法,计算“金税三期”实施前三年 (2010—2012 年) 基金、券商、保险、信托、社保基金等机构投资者持股数总和占期末总股本的比重均值,由高到低将样本划分为十组,取最高三组和最低三组样本分组回归。是否为四大审计方面,本文按照样本期间是否始终由四大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将样本企业分组回归。若理论机制成立,则税收征管数字化能够通过缓解信息不对称抑制应计和真实盈余管理,但无法通过缓解信息不对称影响分类转移盈余管理。

结果如表 3 所示,“金税三期”实施显著降低了机构投资者持股比较低企业、非四大审计企业的应计和真实盈余管理程度,而对机构投资者持股比较高企业、四大审计企业的应计和真实盈余管理无显著影响,表明税收征管数字化能够通过缓解信息不对称抑制应计和真实盈余管理。同时,表 3 第 (5) 列、第 (6) 列、第 (11) 列、第 (12) 列中 *Reform* 的估计系数均不显著,表明税收征管数字化无法通过缓解信息不对称直接影响分类转移盈余管理。

表 3 税收征管数字化、信息不对称与三类盈余管理

Panel A: 机构投资者持股比						
变量	(1)	(2)	(3)	(4)	(5)	(6)
	<i>AEM</i>		<i>REM</i>		<i>CEM</i>	
	高	低	高	低	高	低
<i>Reform</i>	-0.0088 (0.0093)	-0.0087* (0.0050)	-0.0190 (0.0269)	-0.0736** (0.0326)	0.0032 (0.0042)	0.0026 (0.0057)
控制变量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公司、年份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样本量	2283	2242	2283	2242	2283	2242
Adj-R ²	0.535	0.632	0.286	0.280	0.135	0.131

① 限于篇幅,多时点双重差分异质性稳健估计的结果见线上附录附表 C.3。

续表 3

Panel B: 是否为四大审计						
变量	(7)	(8)	(9)	(10)	(11)	(12)
	<i>AEM</i>		<i>REM</i>		<i>CEM</i>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i>Reform</i>	0.0042 (0.0072)	-0.0075*** (0.0021)	0.0095 (0.0123)	-0.0379*** (0.0134)	-0.0015 (0.0073)	0.0058 (0.0035)
控制变量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公司、年份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样本量	442	7066	442	7066	442	7066
Adj-R ²	0.608	0.606	0.594	0.285	0.101	0.101

其次,本文考察分类转移盈余管理对应计和真实盈余管理的替代作用。试点前企业应计和真实盈余管理程度越高,越容易受“金税三期”抑制,也更有动机转向分类转移盈余管理。据此,本文分别计算“金税三期”实施前三年(2010—2012年)样本企业应计盈余管理和真实盈余管理的均值,由高到低将样本划分为十组,取最高三组和最低三组样本分组回归。若观察到“金税三期”显著提高了较高组别企业分类转移盈余管理程度,而对较低组别企业分类转移盈余管理不存在显著影响,则说明企业能够利用分类转移盈余管理替代应计和真实盈余管理,实现盈余管理目标。

结果如表 4 所示,第(1)列、第(3)列 *Reform* 的估计系数均显著为正,表明“金税三期”显著提高了试点前应计和真实盈余管理程度较高组别企业的分类转移盈余管理程度;第(2)列、第(4)列 *Reform* 的估计系数均不显著,表明“金税三期”对试点前应计和真实盈余管理程度较低组别企业的分类转移盈余管理不存在显著影响。这表明税收征管数字化实施后,企业会提高分类转移盈余管理程度,替代受抑制的应计和真实盈余管理。

表 4 分类转移盈余管理对应计和真实盈余管理的替代影响

变量	(1)	(2)	(3)	(4)
	<i>CEM</i>			
	<i>AEM</i> 高	<i>AEM</i> 低	<i>REM</i> 高	<i>REM</i> 低
<i>Reform</i>	0.0119*** (0.0042)	0.0018 (0.0046)	0.0110* (0.0057)	-0.0002 (0.0064)
控制变量	Yes	Yes	Yes	Yes
公司、年份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Yes
样本量	2271	2240	2279	2237
Adj-R ²	0.085	0.106	0.098	0.112

上述机制分析过程验证了本文的理论逻辑,即税收征管数字化通过缓解信息不对称,抑制了应计和真实盈余管理,但无法限制分类转移盈余管理,导致企业策略性地转向成本相对更低、更为隐蔽的分类转移盈余管理,引起分类转移盈余管理程度提高。

(四) 异质性分析^①

1. 所有权性质

现有研究指出,国有企业因承担着沉重的政策性负担,存在预算软约束问题,税收敏感性较低。在政策性功能要求下,国有企业实际经营中会较少考虑税负因素,税收政策变动对国有企业纳税遵从的影响不明显。而且国有企业特殊的政府背景使其更了解和更易从政府手中获得税收优惠(樊勇、李昊楠,2020),税收优惠落实程度较高。相较于国有企业,非国有企业拥有更强的逃税动机,信息不对称程度较高,更有意愿通过各种手段隐匿涉税信息、规避纳税义务(张克中等,2020),同时制度性交易成本限制了非国有企业税收优惠落实。因此,税收征管数字化对缓解非国有企业信息不对称、促进非国有企业纳税遵从和税收优惠落实的作用可能会更大,进而对非国有企业盈余管理行为产生更明显的影响。分组回归结果显示,“金税三期”显著降低了非国有企业应计盈余管理和真实盈余管理程度、提高了非国有企业分类转移盈余管理程度,而对国有企业三类盈余管理均不存在显著影响。

2. 政治关联

企业和政府之间的政治关联会影响税收和经济资源的配置,企业通过董事、高管的政治关联向政府寻租,一方面更容易地获得税收优惠、政府补助等经济支持,降低企业经营风险;另一方面会使企业受到更多政治干预,承担更多政策性负担,具有政治关联的高管为实现政治目标而偏离最优经营策略,导致企业对政策及市场环境变化的敏感性下降(田利辉、张伟,2013)。因此,对于存在政治关联的企业,税收征管数字化缓解信息不对称、促进纳税遵从和落实税收优惠的作用有限。同时,由于政治目标的存在,追求股东财富最大化不再是唯一选择,政治关联企业调整盈余管理行为的动机较弱。遵循田利辉和张伟(2013)的研究,若企业的董事长或总经理曾经或目前在政府部门任职,或者曾经或目前当选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则认为该企业为政治关联企业,否则为非政治关联企业。分组回归结果显示,“金税三期”显著降低了非政治关联企业应计和真实盈余管理程度、提高了非政治关联企业分类转移盈余管理程度,而对政治关联企业三类盈余管理的影响均不显著。

3. 国地税征管

国地税二元征管体制设计导致不同征管机构的税收努力存在明显差异。国税局受上一级国税系统垂直管理,对当地的税收征管独立于地方政府,税收执法更加严格、征管效率更高。地税局管理权限集中于地方政府,地区间横向税收竞争的存在使得地税局有较大的动机放松税收征管、削减实际税率以吸引资本流入(周黎安,2007)。相对于国税局,税收征管数字化能在更大程度上压缩地税机关的操作弹性与空间(张克中等,2020),缓解地税局征管企业信息不对称,促进纳税遵从、落实税收优惠。本文根据所得税分享改革中企业税收征管权限归属对样本进行了分组回归,结果显示,“金税三期”显著降低了地税局征管企业的应计和真实盈余管理程度、提高了地税局征管企业的分类转移盈余管理程度,而对国税局征管企业三类盈余管理的影响均不显著。

五、结论与启示

加快推进智慧税务建设,实现税收征管数字化,是深化税收征管制度改革、提升税收法治化水

^① 限于篇幅,异质性分析的结果见线上附录D。

平和税收治理效能的重要目标,也是推进高质量发展,发挥税收在国家治理中的基础性、支柱性、保障性作用的重要支撑。^①本文利用2009—2016年A股上市公司数据,基于“金税三期”工程构建准自然实验,考察了税收征管数字化对企业盈余管理策略性选择的影响,研究发现,税收征管数字化显著降低了企业应计盈余管理和真实盈余管理程度,但提高了分类转移盈余管理程度。机制分析表明,这一效应是由于税收征管数字化降低信息不对称,促进纳税遵从、落实税收优惠,提高了应计盈余管理和真实盈余管理的实施成本,从而对其形成抑制,但由于分类转移盈余管理并不涉及应税项目操纵,加之现行的“金税三期”系统未将非经常性损益指标纳入财务监测,税收征管数字化无法有效限制分类转移盈余管理,引起企业从应计盈余管理和真实盈余管理转向成本更低、隐蔽性更强的分类转移盈余管理,以实现盈余管理收益最大化。异质性分析表明,税收征管数字化对企业盈余管理策略性选择的影响主要体现在非国有企业、非政治关联企业和地税局征管企业中。

本文的研究结论为深化税收征管改革、完善现代公司治理提供了以下重要的政策含义。

第一,应持续推进税收征管数字化升级和智能化改造,通过促进税款“应收尽收”、税收优惠“应享尽享”,充分发挥税收征管数字化对机会主义盈余管理的外部治理效能。本文研究表明,“金税三期”能够改善企业与税务部门在征收税款和享受税收优惠过程中的信息不对称问题,促进纳税遵从、落实税收优惠,降低企业利用应计和真实盈余管理调增利润的动机,进而降低企业应计和真实盈余管理程度,有利于规范企业财务行为与市场秩序,避免企业利用应计和真实盈余管理美化业绩形象,误导财务报表使用者。目前,“金税三期”已经实现全国覆盖,“金税四期”也已在全国多个省市上线试点,税收征管数字化进程不断深化,对于防范偷税漏税、营造良好的市场秩序具有积极意义,同时,促进税款“应收尽收”和税收优惠“应享尽享”,既符合税收征管数字化的建设目标,又能够规范企业财务行为,实现协同治理。因此,应当持续推进税收征管数字化升级和智能化改造,推动“金税四期”试点推广,发挥税收在国家治理中的基础性、支柱性、保障性作用以及政策协同治理效应。

第二,尽管税收征管数字化能够发挥对应计和真实盈余管理的外部治理效能,但会刺激企业采取更高分度的分类转移盈余管理。本文研究发现,现行的“金税三期”系统缺乏对分类转移盈余管理的监管和制约,在应计和真实盈余管理受抑制的情况下,企业会更多地采取分类转移盈余管理夸大核心利润,导致核心盈余错误高估,不利于财务信息质量的提高和资本市场秩序的优化。尽管分类转移盈余管理并不直接影响税务部门税款征收,但会引发企业核心盈余的持续错误定价,提高企业财务风险,不利于投资者和财务报表使用者正确判断企业生产经营及盈利情况,对资本市场投融资及产品市场经营秩序造成较大损害,并最终对可能税收产生不利影响。因此,必须关注企业盈余管理的新动态,将分类转移盈余管理监测纳入税收信息系统,通过数字化建设,加强税收大数据与企业财务信息联动,例如,在“金税三期”决策支持系统中,新设营业外收入与营业外支出变动率、扣非后净利润及扣非后净利润变动率等指标,并加强“金税三期”系统与地方市场监管部门、金融部门的信息交流与反馈,不断强化税收大数据在社会管理、公司治理领域的深层次应用。

第三,税收征管数字化对不同类型的企业盈余管理策略性选择的影响存在较大差异。本文异质性分析发现,相较于国有企业、政治关联企业和国税局征管企业,非国有企业、非政治关联企

^① <http://www.chinatax.gov.cn/chinatax/n810219/n810744/c101763/index.html#>.

业和地税局征管企业具有更强的盈余管理动机与空间,“金税三期”抑制了非国有企业、非政治关联企业和地税局征管企业利用应计和真实盈余管理调增利润,但导致其利用分类转移盈余管理调增核心利润的程度显著提高。特别地,当前国地税合并背景下,相较于原国税局征管企业,原地税局征管企业面临的税收执法和避税空间大幅缩减,原地税局征管企业可能具有更强的调增核心利润的分类转移盈余管理动机,税收征管中应当进一步加强对非国有企业、非政治关联企业和原地税局征管企业分类转移盈余管理活动的监管,减少这类企业的机会主义分类转移盈余管理行为。

参考文献:

1. 程新生、武琮、修浩鑫、柳扬:《企业研发投入波动与信息披露:投资者创新包容视角》,《经济研究》2022年第6期。
2. 杜瑞、李延喜:《企业研发活动与盈余管理——微观企业对宏观产业政策的适应性行为》,《科研管理》2018年第3期。
3. 樊勇、李昊楠:《税收征管、纳税遵从与税收优惠——对金税三期工程的政策效应评估》,《财贸经济》2020年第5期。
4. 李春涛、王悦、张璇:《激进避税行为与股价暴跌风险——外部监管视角与因果识别策略》,《财贸经济》2021年第6期。
5. 李春涛、赵一、徐欣、李青原:《按下葫芦浮起瓢:分析师跟踪与盈余管理途径选择》,《金融研究》2016年第4期。
6. 李增福、董志强、连玉君:《应计项目盈余管理还是真实活动盈余管理?——基于我国2007年所得税改革的研究》,《管理世界》2011年第1期。
7. 李增福、骆展聪、杜玲、汤旭东:《“信息机制”还是“成本机制”?——大数据税收征管何以提高了企业盈余质量》,《会计研究》2021年第7期。
8. 刘宝华、罗宏、周微:《股权激励行权限制与盈余管理优序选择》,《管理世界》2016年第11期。
9. 刘慧龙、张玲玲、谢婧:《税收征管数字化升级与企业关联交易治理》,《管理世界》2022年第6期。
10. 刘永涛:《研发费用税前加计扣除政策及会计政策辨析》,《税务研究》2018年第1期。
11. 柳光强:《税收优惠、财政补贴政策的激励效应分析——基于信息不对称理论视角的实证研究》,《管理世界》2016年第10期。
12. 陆建桥:《中国亏损上市公司盈余管理实证研究》,《会计研究》1999年第9期。
13. 孙雪娇、翟淑萍、于苏:《大数据税收征管如何影响企业盈余管理?——基于“金税三期”准自然实验的证据》,《会计研究》2021年第1期。
14. 田利辉、张伟:《政治关联影响我国上市公司长期绩效的三大效应》,《经济研究》2013年第11期。
15. 王雪平:《税收执法提升了企业财务报告质量吗——基于“金税工程三期”的准自然实验》,《贵州财经大学学报》2020年第3期。
16. 吴联生、薄仙慧、王亚平:《避免亏损的盈余管理程度:上市公司与非上市公司的比较》,《会计研究》2007年第2期。
17. 许丹丹、上官鸣:《税收征管信息化、融资约束与盈余质量——基于“金税三期”工程的准自然实验》,《金融发展研究》2022年第12期。
18. 叶康涛、刘行:《税收征管、所得税成本与盈余管理》,《管理世界》2011年第5期。
19. 曾亚敏、张俊生:《税收征管能够发挥公司治理功用吗?》,《管理世界》2009年第3期。
20. 张克中、欧阳洁、李文健:《缘何“减税难减负”:信息技术、征税能力与企业逃税》,《经济研究》2020年第3期。
21. 张立光:《税收征管与公司投资行为研究》,西南财经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21年。
22. 周黎安:《中国地方官员的晋升锦标赛模式研究》,《经济研究》2007年第7期。
23. 周夏飞、魏炜:《非经常性损益披露监管与归类变更盈余管理——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证据》,《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5期。
24. 朱凯、潘舒芯、胡梦梦:《智能化监管与企业盈余管理选择——基于金税三期的自然实验》,《财经研究》2021年第10期。
25. Abernathy, J. L., Beyer, B., & Rapley, E. T., Earnings Management Constraints and Classification Shifting. *Journal of Business Finance & Accounting*, Vol.41, No.5-6, 2014, pp.600-626.
26. Beck, T., Levine, R., & Levkov, A., Big Bad Banks? The Winners and Losers from Bank Deregula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The Journal of Finance*, Vol.65, No.5, 2010, pp.1637-1667.

27. Butts, K., & Gardner, J., did2s: Two-Stage Difference-in-Differences. *The R Journal*, Vol.14, No.3, 2022, pp.162-173.
28. Cengiz, D., Dube, A., Lindner, A., & Zipperer, B., The Effect of Minimum Wages on Low-wage Jobs.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Vol.134, No.3, 2019, pp.1405-1454.
29. Cohen, D. A., & Zarowin, P., Accrual-Based and Real Earnings Management Activities Around Seasoned Equity Offerings. *Journal of Accounting and Economics*, Vol.50, No.1, 2010, pp.2-19.
30. Dechow, P. M., Sloan, R. G., & Sweeney, A. P., Detecting Earnings Management. *The Accounting Review*, Vol.70, No.2, 1995, pp.193-225.
31. Fan, Y., Barua, A., Cready, W. M., & Thomas, W. B., Managing Earnings Using Classification Shifting: Evidence from Quarterly Special Items. *The Accounting Review*, Vol.85, No.4, 2010, pp.1303-1323.
32. Fang, V. W., Huang, A. H., & Karpoff, J. M., Short Selling and Earnings Management: A Controlled Experiment. *The Journal of Finance*, Vol.71, No.3, 2016, pp.1251-1294.
33. Graham, J. R., Harvey, C. R., & Rajgopal, S., The Economic Implications of Corporate Financial Reporting. *Journal of Accounting and Economics*, Vol.40, No.1-3, 2005, pp.3-73.
34. Haw, I. M., Hu, B., Hwang, L. S., & Wu, W., Ultimate Ownership, Income Management, and Legal and Extra-Legal Institutions. *Journal of Accounting Research*, Vol.42, No.2, 2004, pp.423-462.
35. Hunt, A., Moyer, S. E., & Shevlin, T., Managing Interacting Accounting Measures to Meet Multiple Objectives: A Study of LIFO Firms. *Journal of Accounting and Economics*, Vol.21, No.3, 1996, pp.339-374.
36. Irani, R. M., & Oesch, D., Analyst Coverage and Real Earnings Management: Quasi-Experimental Evidence. *Journal of Financial and Quantitative Analysis*, Vol.51, No.2, 2016, pp.589-627.
37. Lederman, L., Reducing Information Gaps to Reduce the Tax Gap: When Is Information Reporting Warranted. *Fordham Law Review*, Vol.78, No.4, 2010, pp.1733-1759.
38. Liu, X. X., Yang, J. Y., Di, R., & Li, M. H., CFO Tenure and Classification Shifting: Evidence from China. *Emerging Markets Finance and Trade*, Vol.58, No.6, 2022, pp.1578-1589.
39. McVay, S. E., Earnings Management Using Classification Shifting: An Examination of Core Earnings and Special Items. *The Accounting Review*, Vol.81, No.3, 2006, pp.501-531.
40. Perry, S. E., & Williams, T. H., Earnings Management Preceding Management Buyout Offers. *Journal of Accounting and Economics*, Vol.18, No.2, 1994, pp.157-179.
41. Pomeranz, D., No Taxation without Information: Deterrence and Self-Enforcement in the Value Added Tax.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105, No.8, 2015, pp.2539-2569.
42. Ramanna, K., & Roychowdhury, S., Elections and Discretionary Accruals: Evidence from 2004. *Journal of Accounting Research*, Vol.48, No.2, 2010, pp.445-475.
43. Roychowdhury, S., Earnings Management through Real Activities Manipulation. *Journal of Accounting and Economics*, Vol.42, No.3, 2006, pp.335-370.
44. Sun, L. Y., & Abraham, S., Estimating Dynamic Treatment Effects in Event Studies with Heterogeneous Treatment Effects. *Journal of Econometrics*, Vol.225, No.2, 2021, pp.175-199.
45. Teoh, S. H., Welch, I., & Wong, T. J., Earnings Management and the Long-Run Market Performance of Initial Public Offerings. *The Journal of Finance*, Vol.53, No.6, 1998, pp.1935-1974.
46. Zang, A. Y., Evidence on the Trade-Off between Real Activities Manipulation and Accrual-Based Earnings Management. *The Accounting Review*, Vol.87, No.2, 2012, pp.675-703.
47. Zwick, E., & Mahon, J., Tax Policy and Heterogeneous Investment Behavior.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107, No.1, 2017, pp.217-248.

Digitalization of Tax Enforcement and Strategic Choices for Corporate Earnings Management

FANG Hongsheng, XIA Kainan (Zhejiang University, 310058)

Summary: Th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of tax enforcement is a key goal of tax reform, particularly in China. In 2021, the “Opinions on Further Deepening the Reform of Tax Collection and Administration” outlined the goal of “governing taxes with data,” emphasizing the comprehensive advancement of digital and intelligent tax enforcement to significantly enhance tax compliance and social satisfaction. Central to this reform is the “Golden Tax III” Project (GT3), a nationwide project launched in 2013 that leverages big data, cloud computing, and cross-agency collaboration to monitor transactions, invoices, and tax filings in real time. While GT3 has been lauded for curbing tax evasion and improving tax compliance, its broader implications for corporate financial reporting—specifically, how firms adapt their earnings management strategies in response to heightened oversight—remain underexplored.

This paper examines how the digitalization of tax enforcement reshapes corporate earnings management strategies, using panel data from Chinese A-share listed firms (2009–2016) and quasi-natural experiments based on GT3. Employing a staggered difference-in-differences approach, the study yields three key findings. (1) The digitalization of tax enforcement significantly reduced Accrual-based Earnings Management (AEM) and Real Earnings Management (REM) but increased Classification-shifting Earnings Management (CEM). (2) This shift occurs because digitalization reduces information asymmetry, enhances tax compliance, implements tax incentives, thus inhibiting AEM and REM. However, it cannot restrain CEM, leading firms to replace suppressed AEM and REM with CEM. (3) Heterogeneity analysis shows that the impact of digitalization is more pronounced among non-state-owned enterprises, non-political-affiliated firms, and companies managed by local tax bureaus.

This paper contributes to the literature in several ways. First, it integrates CEM into tax enforcement research, revealing nuanced strategic adaptations by firms in response to digitalization and enriching the research on the economic consequences of tax enforcement and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earnings management. Second, this paper deepens the mechanism analysis of how digitalization affects earnings management, proposing a novel analysis framework of “information asymmetry mitigation-cost difference-strategic substitution” to explain why digitalization suppresses AEM and REM but stimulates CEM. Third, this paper provides insights for advancing tax digitalization and improving corporate governance.

Keywords: Digitalization of Tax Enforcement, China’s “Golden Tax III” Project, Earnings Management

JEL: G34, H32, M41

责任编辑: 馨 兰